

关于世界秩序的几个问题

周旭东

人类理想中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冷战结束后，这一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本文将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和模式的研究作一综合性述评。

一、世界秩序的概念和内涵

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两位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世界秩序下的定义为多数人接受，一是法国学者、著名国际政治学权威雷蒙·阿隆提出的定义。雷蒙·阿隆认为“秩序”具有五种不同涵义：现实的任何有规则的安排，各组成部分的有序关系；生存的最低要求；共存的最低条件；舒适生活的必要环境。人们认同其中的第四点即世界秩序就是生活在国际社会的成员相互共存的最低条件。另一位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认为，世界秩序是对人类活动和国家行为所作的旨在维护世界稳定、和平、合作的一种合理安排。布尔还对世界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概念作了区别：第一，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概念的含义更广，世界秩序不仅包括国家间秩序，而且还包括国家内部的国内秩序以及涵盖了世界政治体系的秩序；第二，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基本，因为人类大社会的终极单位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部族、帝国、阶级或政党，而是个人；第三，世界秩序在道义上优先于国际秩序，世界

秩序指的是全人类的秩序，而不是国际社会内部的秩序。¹

阿隆的学生，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斯坦利·霍夫曼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世界秩序的定义。他认为，第一，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关系处于和睦状态的一种理想化模式；第二，世界秩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有规章的程序，它能提供制止暴力、防止动乱的有效手段；第三，世界秩序是指合理解决争端和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有序状态。²

从三位学者的定义上看，阿隆和霍夫曼都倾向于把世界秩序理解为国家间秩序，而布尔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在含义上更广一些，内涵上更深刻一些。

我国学者较多地从现实考虑冷战后世界秩序这一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慎之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对“新秩序”不可拘泥于名词，不论旧秩序、新秩序都是实际存在过、现在存在着或可能出现的国际力量的对比所形成的。它是实在的，不是虚幻的。但是由于倡导者往往要给它加上道义的色彩，因而具有口号的意味。应当透过表象，把握其实质。为了避免混淆起见，也不妨用“新格局”、“新结构”来称呼它。

对世界秩序理论进行全面阐释的还是霍夫曼，他在 1978 年出版的《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一书中，对世界秩序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第一,他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主要有三种结构,一是超级大国之间核威慑下的均势;二是有危机处理机制的国际社会,在危机出现后,尽可能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三是有核军备控制机制的国际社会。

第二,他认为世界秩序政策的目的在于使国际社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积极变化。1. 国际社会更公正。在新秩序下不应该是少数大国支配一切,而是更多的国家参与,要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 国家追求的目标更理性。在新秩序下,国家的追求不再是领土的控制、资源和市场的占有,而是创造出有利于国际合作的环境。3.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4. 国际组织的作用更强。在传统秩序中,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控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地区、给予其盟国各种支持,从而使国际社会出现等级制。在新秩序下,国际组织的作用将越来越强。5. 主权的弱化。国家将更多的主权交给国际组织,国家的作用将变小。

第三,他就世界秩序政策的推行提出具体的建议。1. 对国内社会秩序进行改革,这是实现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前提;2. 各国经济联系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争难以发生,而和平思想深入人心。3. 在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的基础上,推动一体化进程,让各国放弃部分主权,建立全球性的跨国机构。

第四,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他的看法。作为一个美国学者,霍夫曼无疑很关心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美国应该谋求“没有霸权的领导地位”,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要王道,不要霸道”。在霍夫曼看来,学会当领导而不是当霸主,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座右铭。二次大战后,美国一直以世界领导自居,美国霸权正是源于这一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反省自己的对外政策,重新树立“当领导,不当霸主”的形象。霍夫曼特别提醒美国政府注意两点:一是以实力支配、控制别国的行动往往会导致动乱;二是单单美国一家是无力建立世界秩序的。

二、世界秩序的模式

关于21世纪世界秩序的模式,各国学者有多种设想,总的说来,可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类。

一、可归入理想主义一类的世界秩序模式有“地球村”模式、世界政府模式等。

“地球村”模式由美国学者巴尼特和卡瓦纳夫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高科技的发展已把全世界各地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国际性的,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难民问题等等,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在他们看来,今后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根本问题将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与地方化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

应该说,这一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即科技的发展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这一影响肯定是深远的,当今世界,确实有许多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科技的发展即使形成“地球村”,那么,“村庄”与“村庄”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能否和睦相处仍是一个问题。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对这一模式持反对态度,认为“地球村”是又一个“乌托邦”。

关于世界政府的模式有多种设想,其中比较现实的是对联合国进行改造,以建立世界新秩序。联合国是在国联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个国际组织,它为各国的沟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它协调各方的利益,并力图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健康状况、鼓励尊重人权、制止部分冲突等为世界服务。在各国际组织中,联合国的影响是最大的,正如黑人作家本·奥克里所说的,尽管联合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联合国是惟一有能力含糊地表达世界同一概念、演奏人类交响曲的国际组织”⁴。但是,联合国远不是一个有权力的政治实体,相反,它常常受制于某个大国或某些国际集团,

大国在符合自己利益时，会打起联合国的旗帜，而在不符合自己利益时，往往会绕过联合国，使联合国受辱。两次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世界政府能否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还是远没有解决的问题。

部分学者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对国际法的修改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应通过制定规则确保安全和稳定，国际法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正式规则框架，大多数国家将会发现法律能够对促进和指导广泛利益基础上的合作起到有力作用，国际法将使世界从无政府状态转向更加合作的国际社会，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国际法的作用至关重要。⁵⁵

二、可归入现实主义一类的世界秩序模式有“单极霸权”模式、“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多极均势模式”等。

前两种模式分别由美国学者查尔斯·克劳瑟默和另一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中国学者也曾提出类似的模式，即“一超多强”。

克劳瑟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随着苏联的瓦解，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地位。因此，世界格局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几个二流世界强国并存的局面。

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重要的问题单靠美国自己去处理也是不行的。美国需要盟国的合作。所以，约瑟夫·奈提出“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他认为，回复到“两极世界”已不可能，多极化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美国的单极霸权会有许多麻烦，理想而又现实的模式是“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⁵⁶。

多极均势模式以基辛格为代表。他认为，世界要稳定，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霸权，二是均势。与霸权相比，均势更可靠。基辛格强调，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基辛格所追求的均势，就是世界各地、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权力平衡，这样的平衡应该是多极的。⁵⁷早在冷战期间，基辛格就提出了著名的“五大力量中心”说（美、苏、中、日本和西欧），他认为这样

的多极均势是世界有序的根本保障。冷战结束后，基辛格又指出：“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而不像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外是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⁵⁸他强调，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秩序仍然只能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

三、中国与国际秩序

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一直是东亚区域秩序的维护者。中央党校的门洪华先生认为：朝贡秩序是中国国内政治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它强调“四夷顺而中国宁”，“修文德服远人”，“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而天下畏之”。中国对华夷的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而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其目的是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所需要的外部安全，通过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周边关系，是一种柔性的霸权秩序。⁵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开始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秩序，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章百家先生认为：中国人在20世纪一半时间里所追求的，只是他们在19世纪所失去的东西——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由于长期的屈辱，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二次大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自建国之初起，新中国便质疑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用西方学者的话说，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康奈尔大学

的陈兼先生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苏联发起挑战。^À

同时对抗两大超级大国,不是中国的国力所能承担的。根据毛泽东主席两霸中争取一霸的策略,中美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善,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半信半疑地开始融入世界。中国与欧共体、国际奥委会、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了联系。

1979年后,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推动下,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在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前两个时期。这其中的标志是中国经过十五年的谈判,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

笔者认为,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还成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就承担起这一责任。

学者们认为,中国还应该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即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中国在新世纪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不过,中国要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中作出贡献,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仍然崇尚实力的现代国家体系中,中国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国力,中国只有发展成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中有自己的声音,用章百家先生的话说,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第二,在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进程中,要有自己的理念。到目前为止,中国提出的理念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霸权,赞成多极化;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这两个方面在西方

都碰到挑战。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多极化也并不一定能带来世界和平,二次大战前世界就是多极的(英法、苏、德意、美、日)。而目前西方流行的人权大于主权则恰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不干涉内政相对。

第三,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中一些规则的制定。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认为,中国在融入世界后,主动性不够,在国际组织中很少提出建设性的主张。这是中国的学者和外交家们所面临的一个任务。

第四,在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要有理想主义。中国应树立维护国际道义的世界大国形象。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应该仅仅是我们庞大的市场,而应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

总之,对人类理想的世界秩序,各国学者从理论到模式都作了有益的探讨,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历史的发展将会作出见证。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对国际秩序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 释

¹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⁰ » Stanley Hoffman *Primacy or World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Cold War*. New York 1978 p. 188 p. 208.

^¼ ½ 康威·汉德森:《国际关系》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第351页。

^¼ ¼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第472页。

^À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À 门洪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

^À 陈兼:《关于中国和冷战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周旭东: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楚全)